

“去历史化”写作的负面影响

□ 泓 峻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这对我们当前文艺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几年来,在涉及当代文学的一些评论文章里,类似“去历史化”、“非历史化”这样的提法,已经成为描述中国文学近一二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动向、阐释一些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与思想内容、评价一些作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经常被使用的语汇。

肯定文学“去历史化”倾向的批评家大多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其具体表现是过分强调外在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重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事件对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影响;在叙事的过程中,作家往往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观念,为它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目的、规律,并试图把那些具有偶然性的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复杂的人性,都纳入到以社会进步、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大叙事”之中。在有些评论家看来,那些被“历史化”写作模式所支配的文学作品中,本应该是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往往成为启蒙、革命等历史大叙事操纵的牵线木偶,其作为人的主体性、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个体生命的丰富性,都难以得到体现。因此,这样的作品,难免要给人以概念化、简单化的印象。而导致文学叙事“历史化”的理论基础,则被认为是几代作家所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进化论历史观,以及建立在“典型论”之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评论家们指出,这种“历史化”的叙事模式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部“红色经典”中得以成熟的,之后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着极强的规训作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兴起的进程中,仍然发挥了其巨大的影响力。

而中国文学“去历史化”的努力,被认为正是为走出“历史化”叙事模式的巨大阴影而产生的。按照有些学者的叙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中,开始隐约出现了走出文学“历史化”写作模式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后来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进一步得

到明确,最终发展成为近20年来中国文学带有方向性的选择。从写作策略上讲,作为对“历史化”写作的规避、超越,“去历史化”或者表现为作家在写作中以重写历史的方式对官方固有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或者表现为作家以主观化的视角对外的历史进行重构;在有些作家那里,“去历史化”可能意味着以个人化、性别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历史”视角消解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大历史”,对有些作家而言,“去历史化”甚至可能是用突显叙事话语自身逻辑的方式,让历史在文学叙事中完全处在缺席的状态。

二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去历史化”的写作趋向,不用评论家的提倡,就已经颇具规模与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界似乎更应当从批判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一下“去历史化”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认真思考一下各种各样的“去历史化”写作倾向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对它们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发现,在这方面,一些优秀的作家比批评家反倒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更能够保持清醒。因而,当批评家们顺着类似于“去历史化”这样的思路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评价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同。比如,一方面,批评家们热衷于谈论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世俗化转向,认为王安忆让自己的作品进入上海的弄堂深处,表现小市民的琐碎生活这一写作姿态,是对此前带有明显启蒙立场的写作姿态的超越。但是,作家本人却声称:“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并非“创作的大道”,并怀疑它“会突出与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容易使人纠缠于细枝末节、潜心构思的精致与巧妙”,“忽略了大的悲恸与大的欢乐的情节”。

实际上,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刻与厚重,大多与此相关。因此,与评论家们一厢情愿地热衷于指认一些优秀作家作品的“去历史化”倾向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优秀作家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作品与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的关联,更愿意谈论他们的作品触及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在他们那里,“去历史化”或者“非历史话”这样的说法,很难作为一种正面的文学价值被接受。

三

把近一二十年来的优秀作家与优秀作品,的成功,归咎于“去历史化”操作的成功,可能真是一种误会。而把文学创作中“去历史化”倾向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对过去形成的僵化的文学叙述模式的不满,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文学探索,也是相当片面的。促使中国当代文学最终形成“去历史化”写作倾向的力量,很可能主要来自文学之外,具体地讲,一是受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一是受到了社会层面上的文学艺术商业化风气的影响。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的确曾经产生过一些有益的启发,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去历史化”写作作为后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的产物,也应当作为如是观。

在谈论中国文学的“去历史化”写作倾向时,有一个现象是应该引起关注的,那就是这种写作倾向,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社会的商业化大潮,是同步出现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向文化艺术领域扩张的直接结果。而“去历史化”,正是一些文学作者向大众文化靠拢时采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之一。

在实现商业利益方面,娱乐化的文化产品,有时远比那些严肃思考社会人生的作品更具有

潜力。大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以及一些文艺作品中将严肃的历史变成时尚的文化消费符号的做法,其实都与商业文化对大众娱乐性的追求有关。除此之外,暴力、色情、乱伦、偷窥、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也都是商业文化借以招徕大众的主要手段。许多文学作品不顾人物性格的完整与统一,不顾生活自身的逻辑,不顾历史背景,想方设法在作品中加入这些元素,正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去历史化”写作倾向之所以在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因为这些领域具有比严肃文学更浓重的商业化色彩。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底层写作”这些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中,对历史的游戏化态度,以及任意编造极端化叙事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重合并非偶然,它表明一些所谓的“严肃文学”作家,也在对读者的阅读趣味加以迁就,而其背后,同样有着商业利益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严肃对待历史的态度,清醒的历史理性,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角度,对于“严肃文学”创作而言,恐怕主要是一种保证其不被商业化原则过度侵蚀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一种限制作家思想的深度与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消极力量。

四

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讲,大量“非历史化”作品的出现,实际上也与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历史意识的淡薄、历史经验的匮乏、从宏观上思考与把握历史能力的欠缺有关。

谈到“80后”的文学创作,人们首先想到的

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 大家谈 ◆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都市文学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飞速发展而兴盛发达,与之颀颀前行的是都市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成熟,呈现出两种城市文学研究范式:再现论的城市文学研究和表现论的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周礼红的《消费主义文化与20世纪90年代都市小说白领书写》即是这种都市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的结晶,体现了对文化研究传统的认同和借鉴。作为一种新型文学批评范式,白领文学批评的创新及建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者将白领文学看做一种社会存在,视之为消费社会的一种反映和表现,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深刻的理性,将历史性批评和社会性关注相结合,对白领文学及白领小说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和解读。该著打破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壁垒,以史论的形式从消费主义文化视角研究20世纪90年代都市小说中白领的形成、生存状态、美学意义和文化精神。二是该著将白领文学批评建立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基石之上,从根本上改变评价和判断白领产生及白领文化生成的理论依据,极大地拓宽白领文学及文化的理论空间,促使学界树立一种新的白领文化观,去认识白领文化的本来意义、真正动力和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三是该著独辟蹊径,选择学界少有涉猎的白领文学作为理论批评的出发点,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消费主义文化对白领生活方式的影响,分析都市小说塑造白领形象的狂欢化叙述、传奇化叙事、符码化叙事、性别化叙事的方法及白领形象的都市民间美学意义,讨论都市小说白领的文化精神与都市文化建构之间的关系,从文学、历史、社会等角度全方位的勾画了白领文学批评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为全面认识都市文学特别是都市小说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参照。

作者从社会学、文化学和文学的角度切入

可能是有些青涩的校园文学与青春写作,以及玄幻、穿越、后宫等类型的小说。这些作品要么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截取一些片段,并将它放大成现实本身,生活本身,总让人感到单薄,缺乏精品艺术应有的力度;要么充满夸张怪异的情节,靠荒诞与惊悚制造阅读快感,终归不入艺术的正道。尤其是从这些作品中,你很难感受到一种确定的现实存在,更无法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代作家艺术提升的空间。

其实,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写作,但是,与作为他们父辈的“50后”、“60后”作家相比,“70后”、“80后”写作有时表现出“去历史化”的某些特征,很可能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问题,而与他们的成长背景、与他们接受的文学教育,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念与把握历史的能力有关。

莫言在谈到对一位“80后”作家作品的阅读体验时,曾这样讲:“在故事的框架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电影、港台言情小说、世界经典童话等的影响。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动漫的清峻脱俗,简约纯粹。”这段讲得十分厚道的话,实际上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一代作家不是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读着托尔斯泰、狄更斯,读着《红旗谱》《创业史》成长起来的,甚至也不是读着卡夫卡、海明威、《平凡的世界》《红高粱》成长起来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看着美国大片、日本动漫,看着《还珠格格》《大话西游》走进文学的。在他们长大之后,遭遇的又是一个微信、微博、大数据的时代,信息的大量增殖,阻断了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因此,让这一代人越过当下,进入真实历史的情境之中,已经显得十分困难。深厚的历史感与自觉的历史理性,对他们而言就更加欠缺。这既是这一代人不得不去从事“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写作的原因,同时也是“去历史化”、“非历史化”的文化环境、艺术环境造成的结果。

可见,文学的“去历史化”写作,其对文学的伤害,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客观、冷静看“余秀华现象”

□ 张兴德

如何看待当下网民热议的“余秀华现象”?余秀华的走红和轰动,首先,决不是“非诗的因素”。固然,有的报道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用了“脑瘫诗人”的字样。这种做法和称谓固然不当,但最终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是她的诗歌本身,是她的诗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所谓“余秀华现象”,其本质和焦点是如何看她的诗能引起如此的轰动。在我看来,是她的诗的奇幻、率真、真实,人性的释放以及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吸引了诗坛内外的一些人。她的诗没有直接记述历史事件,但是,却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她让我们从她的诗中,看到了除了小岗村、南街村之外的另外的一个“梁庄”。她的诗展现了另一类的生活真实,为我们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提供一种可供研究、应该关注的社会生活现象——真实的、原始的生活。

应该特别指出,她的诗,只有很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人才能读得懂。说她的诗“既不农民,也不乡土”,这是既没有认真研究她的诗,也表现出了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缺乏了解。一位写诗的文学青年同我讨论余秀华的一首爱情诗。其后半首是这样的:

如果你给我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这位文学青年没有看出诗中的深邃的思想。问我这首诗好在何处?我对她说:“读懂这首诗,关键是理解在农村区分‘稻子’和‘稗子’这件事的意义及其比喻意义。”稻子’和‘稗子’处在粮食的早期,二者长得十分相似,很难区分,而农民春天给稻田除草,就是要善于识别并除掉藏身于众多的稻田中的稗子(因此,稗子的春天等于面临死亡),如果一旦遗漏除不掉,它

就迅速长大,要同稻苗抢水、抢肥,一旦结籽,混杂在水稻里,就要影响稻子的等级。因此,区分稻子和稗子是农民必须掌握的一个绝活,是判断一个农民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很多时候也把区分稻子和稗子引申为做人处事,要善于区分真假的一种能力。有时也把稗子比作善于伪装的坏人。等等,这是内涵十分丰富、应用非常广泛的两个词。诗人在这里不送自己爱慕的人自己写的诗歌(她读对方的诗,对方大概也是诗人吧?),而送他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这里诗人显然有意无意地创造了一个深邃的想象空间,一个含蓄的空间,一个诗的空间!这是农民中来的诗,只有农民才能写出来的诗!在余秀华的诗中,不乏这样的意境和句子。

她的诗,正如一些网友和专家们说的“是生生从土里拔出来的句子,新鲜得掉渣”,“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而不是写出来的充满装饰的盛宴或家宴,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叫你目瞪口呆”。(学者、诗人沈睿)“就算不考虑她的身体状况,她也是位不错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张清华)他的诗歌,也正如发现余秀华的伯乐《诗刊》编辑刘年评论的,她的文字“像包壮的谷粒一样,充满了重量和力量,让人们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无疑,她的诗,在当前是诗坛的一缕清风。自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评价,有时是见仁见智的事儿,我们不强求共识,但是,不能说她走红是“非诗的因素”。自然,她如果不是脑瘫,不是农妇,能不能写出这样的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她的诗是属于她这个特定的个人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同她本人身体的不完美一样,她的诗也存在着不完美。但这不是主流。

还有,余秀华的走红,有的只是伯乐的推荐和网友的善意呼应。就这一点而言,对当前的

文坛来说,也是一种“正能量”,不能说是“文学个案”。古今这样事情并不少见。鲁迅发现萧军萧红,茅盾发现茹志鹃以及小说《林海雪原》的出版等等。就是现在,这样的“个案”也不仅仅是余秀华一人。几个月之前,中央台报道的安徽妇女、48岁的“葱油饼大姐”赵林,15岁得病辍学,21岁离家去上海,卖葱油饼。在浙江退休干部蔡昌森鼓励、指引下,走上创作道路,她白天卖葱油大饼,晚上做家务,夜间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键盘。经过多年的拼搏,创作了十多万字的小小说《蚁群》,引起很大反响。还有,深圳49岁的打工者郭金牛,他的诗歌专著《纸上还乡》在2014年11月同被英国、德国、荷兰等7个国家出版,被誉为“中国农民工诗人”。20多年,郭金牛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指导。当前的文坛须要更多这样的“伯乐”。

从余秀华走红的过程看,也有其必然性,现在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她是经过了15年的辛勤耕耘,才有今天的收获。人们在欣赏她的诗歌的同时,也敬佩她的毅力和勇气。从励志的视角看,她的这些付出和努力,同张海迪比,同全国优秀的残疾人比,毫不逊色,这应该得到肯定,怎么能说连一个励志的典型都够不上呢?还应该特别指出,这之前,她就得到了一些人的关心和照顾(例如,当地残联曾给她送个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读“余秀华现象”不能忘记的,是值得我们提倡的“正能量”。

至于余秀华今后能发展得怎么样,她是真正成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还是从此默默无闻,我们不能预测。不能以此论今日“走红”的是非。我们更应该从这个“个案”中,研究其背后的普遍性问题,不能以“不能复制”为由而将其一棍子打死。

云南作家走进军营

本报(记者 刘秀娟) 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我们·散文诗丛》《时间的年轮——我们》散文诗群作品精选集》首发式暨‘我们’散文诗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我们”散文诗群自2009年成立以来,倡导“有意义的”诗歌写作,为推进散文诗的创作做出很多努力。研讨会上,与会诗人、评论家认为,这些诗集的出版,为散文诗的阅读和研究都留下了重要参照。“我们”散文诗群所持有的开放、包容、有担当的创作态度值得肯定,他们倡导多元化的探索,坚持诗性传统,追求散文诗的思想深度和价值担当,为散文诗这个“美丽的文体”能立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冕、赵敏俐、吴思敬、张清华、王光明、刘福春、箫风、周庆荣、灵焚等数十位诗人、评论家、出版人参加了研讨会。

本报 云南省作协日前组织40余位作家走进武警云南总队参观、学习,与军营作家、文艺工作者举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专题座谈会。作家们走进军营,置身官兵之中,亲眼观摩,亲身体验,大家对官兵充满敬佩和感激,希望将来自己能写出生动感人的官兵形象。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专题座谈会也同时举行。与会者围绕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部队和人民,以及如何增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度、扩大作品的影响力等问题展开探讨。作家们表示,今后要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创作出与时代潮流和人民息息相关的作品。

此外,云南省作协还向武警云南总队二支队赠送数百册书籍、期刊,启动共建图书室活动。(徐兴正)

《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出版

本报 近日,《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由现代出版社出版。该年鉴由张邦卫、赵思运、瀛春华主编,全面整理了2012至2013年间有关茅盾研究的大事记,关于茅盾的重要研究论文、论著,以及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的要目与摘要。

音乐剧《狂奔的拖鞋》将上演

本报(记者 王觅) 近日,怪咖剧团音乐剧《狂奔的拖鞋》在京举办视听发布会。该剧将于4月22日在北京剧空间剧场与观众见面。《狂奔的拖鞋》是怪咖剧团打造的全新作品,也是剧团在音乐剧、儿童剧等领域的新探索。

这是一部发生在京城的黑色喜剧,主人公的坚强奋斗鼓舞人心,亲情感人肺腑,而点缀其间的校园轶事与青春期的情感波折都会让人会心一笑。该剧由樊冲担任编剧、导演、音乐总监,台湾导演陈轶章担任总监制。

全国联墨大展赛启动

本报 由中国楹联学会、中国教育网络电视书画台联合主办的“孟繁锦奖”全国联墨大展赛日前在京启动。

本次比赛拟设“联墨双修奖”、“楹联创作奖”、“书法创作奖”、“少儿奖”和“组织奖”5个奖项。届时

主办方将组织楹联界、书法界的专家、学者对来稿作品进行评审,分为初评、网络复评、终评三个阶段。作为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网络电视书画台将推出该活动专题,报道此项赛事的进展。

(吉召)

桂向明同志逝世

桂向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月18日在江西玉山逝世,享年83岁。

桂向明,笔名绿筠。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新诗、散文诗集《如果我十九岁》《中国的十月》《灵魂在高唱》《人淡如菊》《痕迹》《春风词笔》等。曾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杂文奖二等奖等。